

清代中晚期小说的“粤民走海” 叙述及其文化意义

葛永海 王 丹

清代中晚期涌现了不少以书写广东社会、表现粤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作品,这些内容可称之为“广东叙述”,而其中最具特色的则是“粤民走海”叙述,这一叙述包括了粤民“出山入海”和“走沪出洋”两大阶段。本文以此入手,探索清代中晚期广东民众凭借冒险进取的意识向海洋拓展,寻求财富与机遇的心路历程,同时对前后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叙事特征与思想主题进行总结分析。指出清中晚期“粤民走海”叙述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完成了以家庭型叙事为主导向以游历型叙事为主导的跨越;二是完成了传统人生如梦主题向社会批判与启悟主题的转换。本文通过文学价值的评估与文化内涵的解读,以期全面阐发“粤民走海”叙述所具有的先锋意义。

清代中晚期以至于当代,位于岭南的广东在不少特殊历史时期往往得风气之先,地区经济发展引领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这已基本成为当代人的共识。而对广东文学发展包括对广东的文学叙述的相关研究却较薄弱,一直没有得到文学史学者的足够重视,其价值和意义也未有准确而公允的评判。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清代中晚期小说中“广东叙述”的研究,以揭橥其不可忽视的时代意义。

揆之史实,由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清代中期以来汹涌东进的西方文明开始对广东产生重大影响,至19世纪,广东一跃成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同时,表现粤民生活、书写广东社会、关注广东文化的题材内容应运而生,成为林林总总清代小说中颇引人瞩目的一道风景。尤其晚清时期“山雨欲来风满楼”,小说中的“广东叙述”通过对社会文化变革背景下广东人物故事的细腻描绘,表现了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开放与封闭等文化特质交锋、交融的真实状况。

一、“出山入海”:19世纪中叶之前广东叙述的发展走向

对于广东山水风情的书写,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出现。晋代裴渊和顾微各撰有一部《广州

记》,刘欣期则撰有《交州记》,都是较早专门描写两广地区风土人情的笔记小说。由于岭南开发滞后,自来被视为化外蛮荒之地。时至唐宋,由于官员多贬谪至岭南,中原文脉相续,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广东的“人文渐开”,也出现了如唐裴铏《传奇·崔炜》等以广东为背景的文言小说。自明代中叶以来,由于商品市场的迅猛发展而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集散地,广东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以广东为背景的小说渐成增多之势。广东亦渐被塑造成“蛮荒”与“富庶”这一既相重合又相对立的地域形象,广东人则被视为“山岭之民”与“下海之商”形象的复合体^①。

一方面,小说家对于广东地区的风土人情颇多误解:“岭南多大蛇,长数十丈,专害人。那边地方居民,家家蓄养蜈蚣,有长(丈)尺余者,多放在枕畔或枕中。若有蛇至,蜈蚣便啧啧作声。放他出来,他鞠起腰来,首尾首力,一跳有一丈来高,便搭住在大蛇七寸内,用那铁钩也似一对钳来钳住了,吸他精血,至死方休。这数十丈长,斗来大的东西,反缠死在尺把长、指头大的东西手里。”^②小说家将岭南居民视为生活在荒烟瘴雨之区与蛇兽为伍的蛮民,言辞间不无偏见。

另一方面,在许多外省人眼中,广东商人又“富甲天下”。因此,出现在明后期小说中的粤民形象,几乎无一不是家底殷实的富户,如《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广东合浦珠贩宋老儿,“是个大户,有体面的”^③;又如《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第六类《伸冤篇》第二则《究辨女子之孕》中“潮州府北门瓦子巷”的“家道富足”的饶庆,又同书第六类《伸冤篇》第四则《前子代父报仇》中的“潮州平远县富户”姜逢时^④;又如《江湖奇闻杜骗新书》第九类《谋财骗》之《傲气致讼伤财命》中的广东富商魏邦材,同书第十六类《婚娶骗》之《异省娶妾惹讼祸》中的广东富商蔡天寿^⑤,等等,可见当时粤民善于经商的名气已远播中原。

同是明清小说,就有对广东褒贬不一、是非悖乱的描绘,可见文学作为现实观念的结晶和遗存,并不与时代完全同步。但是,就宏观时序而言,从“山民”到“海商”之变正体现了明清广东地区经济日渐繁荣、文化稳步发展的历史演进之途,这种前后变化在时人观念中表现得极为显豁。明末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六《憎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中,写到温州府秀才韩赞卿“家里穷得火出,守了一世书窗,指望巴个出身,多少挣些家私”,但是当他被选广东一个县学里的司训,却认为这是“晦气”,选着了这一个蛮荒去处,“曾有走过广里的,备知详细,说了这样光景,合家恰像死了人一般,哭个不歇”^⑥。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到了晚清,“贪官污吏,尤以广东为窟穴,其各省无赖之子,人类所不齿者,辄相借贷捐官,以取倍称之息,分省得广东,则亲戚友朋置酒而相贺,到任才数月,莫不满载而归”^⑦。可见,时代不同,世人对于广东的认识竟有天壤之别。

以上情况的发生根源于广东社会自身的历史性变化。粤民大都具有长于迁徙行走的特性,广东三大民系——广府民系、客家民系和潮汕民系,俱是在行走变迁中完成其文化转型过程。一方面,广东行者通过涉韩江、度岭峽,使僻处重山外的岭南与中原文化脐脉相连。尤其是明清以降的商业经济的繁荣,更是促使冒险进取的粤民奔涉中原大地。据史料记载,清代中后期中国商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为广州帮商人,他们“度岭峽,涉湖湘,浮江淮,走齐鲁”,广东顺德商人“或奔走燕齐,或往来吴越,或入楚蜀,或客黔滇,凡天下省郡市镇,无不货随其中”^⑧。另一方面,广东地区背负群山、面向大海的特有地理景貌,不断诱使粤民脱离群山、向着大海去寻找生机。清代小说中的“广东叙述”正较为典型地描绘了粤民从粤北的南雄、嘉应等地,走向沿海广州、潮州的“出山入海”的历史征途。

白话小说《世无匹传奇》出现于清初,题“古吴娥川主人编次、青门逸客点评”。作者身份、

籍贯不详,但据孙楷第考证,“似广东人作”^⑨。该书述及明朝初年广东南雄府平民干白虹扶危济困的侠义行径,宣扬因果报应思想,情节模式不脱世情小说的窠臼。这部小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小说主要发生地南雄府是广东最北地区,与五岭相接,南雄府的珠玑巷自来被视为中原南下岭南的最大通道,因此这里也是广东一省与中原文化交流的最前沿,受后者影响最深;二是小说主人公干白虹扶危济困、行侠仗义,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既有江湖习气,又较多体现儒家传统文化的特征。在清代小说中,将广东文化中这种内陆性特征表现得更为充分的是19世纪初期问世的《岭南逸史》,该书完成于乾隆、嘉庆年间,作者花溪逸士一般被认为是广东客家文人黄岩,叙写明代万历年间广东省潮州府程乡县(清嘉应州)人氏黄逢玉与四女的才子佳人故事。作为客家小说的开先河者,时人评其“标新领异,据实敷陈,堪与国史相表里”(《岭南逸史》嘉庆刻本序),笔法明显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故事情节中出现的山寨文化与《水浒传》也不无关联。小说所关注的不外乎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再加上对才子佳人传统书写模式的沿袭,读者更可以明显感受到小说内容受传统中原文化影响之深。

“广东叙述”的文化特征发生转换的重要标志是《蜃楼志》的出现。《蜃楼志》现存最早刊本是嘉庆九年(1804)刊本衙藏板本。作者为庾岭劳人,庾岭即大庾岭,序中又有“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之语,可知作者并非生于沿海,但是小说却主要写广州十三行洋商苏万魁之子苏吉士一生异行奇遇,对广东海关、洋商多有描绘,这确切表明了清代中后期广东人视野与观念的改变。从《岭南逸史》到《蜃楼志》,从山民仗义、才子佳人到洋商家庭、海关生活,这说明描写广东的清中晚期小说开始挣脱传统文化的怀抱,面向海洋,试图寻找新的文化生机与出路。随着广东社会文化的“出山入海”,小说也完成了“出山入海”的初步跨越。

二、晚清小说中的粤民“走沪”与“出洋”叙述

背山负海的地理特点使粤民在上古时代就开始对海洋充满神秘好奇的幻想,“下海”、“走海”遂成为粤民传统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说在晚清之前,这种人口流动方式产生的影响还颇为有限,那么到了晚清,突破保守、面向海洋、求新求变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由此引导的则是开放、自由的生存方式和开拓、冒险的求财之道。

晚清时期,由于“十里洋场”的开发,此时的粤民大多选择轮船由海道北上,奔涉上海,形成一股强劲的“走沪”风潮。经济的繁荣使晚清上海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大都市,从而引发全国性的移民入沪风潮,而素以开拓冒险著称的粤民正是这股风潮的典型主体,反映在晚清小说中,就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

晚清以前的小说关于“粤民入沪”的描述可谓寥寥无几、着墨甚少^⑩。发展到晚清小说,这种现象发生根本变化。晚清小说中的入沪粤民之人数繁夥、来往频繁程度也远远超过前代作品。主要代表性作品有吴趼人的《恨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发财秘诀》,李伯元的《文明小史》,黄小配的《廿载繁华梦》,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张春帆的《宦海》,彭养鸥的《黑籍冤魂》等。据统计,吴趼人小说中的入沪粤民人数高居同时代小说家作品的榜首。仅以有姓名者为例,如《发财秘诀》中的魏又园及其家叔、陶庆云、陶秀干、花雪畦、舒云旌、蔡以善等七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胡乙庚、胡乙庚同乡、吴日升、梁桂生、黎景翼、何理之等六人;《恨海》中的张鹤亭、张棣华、陈伯和、陈仲蔼等四人;其他不知名姓而北走上海的粤民形象,在其作品中更是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晚清小说中的粤民往返沪粤两地的程度相当频繁。以黄小配《廿载繁华梦》为例,其主人公广东南海县人氏周庸祐曾五到上海,而吴趼人《恨海》中的广东

香山人张鹤亭“每过一两年,便要到上海去一次”^⑩。晚清小说中的粤民如此频繁地移步上海,粤沪几乎成为一条通行无碍的文化走廊,已经具备了相当商业经验的粤民在上海滩终于寻获了可以完全施展和释放才能的巨大舞台。

广东地区的三教九流移步上海无不为利所诱,而在走沪粤民这一群体中,以买办与商人最具活力。广东买办堪称“中国近代买办之父”,他们最先在广东生发,再将阵地转移至上海,导致上海洋行买办,“半皆粤人为之”^⑪;“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若鹜,举国若狂”^⑫。这在吴趼人《发财秘诀》中有典型反映。他们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懂外语,有商贸经验,凭借机巧权变的性格赢得洋商的信任:“洋人第一要会揣摩他的脾气,第二要诚实,第三也轮到说话了。”如陶庆云、陶秀干、魏又园、蔡以善、陶倜臣等,俱是随主入沪办理各种洋行事务的广东买办,而陶庆云又是“同乡到上海的”得意得最快的人物。小说极尽夸张手法书写陶庆云以“巴结”为能事,而陶庆云自己总结“成功”经验时,也无不得意于此:“倘使说话不能精通,懂了以上两层,也是无用的。我此刻虽算是东家赏脸,然而,也要自己会干,会说话才有今日啊。”

另一大群体是走沪粤商,这在吴趼人的《发财秘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等小说中都有较多记载,粤商较之其他外地商人更为成熟,特征亦较明显,这些人:“容易接受外来的新事物,又善于融合、消化、吸收,商品意识浓,价值观念强。他们精明能干,善变兼容,淡泊政治,讲求经济实效。”^⑬他们或居留,或往来粤沪两地,逐步地开拓自己的商业经营,有的规模颇大,如《文明小史》中的粤商甚至将业务拓展到银行业,等而下之的则如《风流眼前报》中的广东潮阳人陈子香,在申开设广成发烟馆,发不义之财。除了上述两大群体外,还有在上海从事洋务的粤人亦为数不少,典型如《新贪欢报》中的陆闰申,为广东留美学生,归国后到上海担任道台的洋翻译^⑭。这代表了在沪粤人的另一种职业类型。

我们从晚清小说中看到,在追逐财富过程中,粤商的经营形式发生了较大改变。晚清以前的小说中出现的粤商形象大多以散商、行商为主,发展到晚清小说,粤商形象悄然转变。他们不再是偶尔做简单的特产贩运小本买卖,而是在上海开设固定的店栈进行长久经营,如广东香山人张鹤亭“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洋货字号”^⑮;广东人胡乙庚在上海洋泾浜开了一家谦益客栈^⑯。有些商家在广东站稳脚跟之后,遂将生意扩及上海地区,出现具有现代营销意义的连锁经营:“是时上海棋盘街有一家广祥盛的字号,专供给船务的煤炭火食,年中生意很大,差不多有三四百万上下……那东主本姓梁的,原是广东人氏。”^⑰甚至有些商家在商业资本充足的情况下,将自己的经营范围从商业扩展到铁路建筑业和银行金融业:“(劳航芥)心上崇拜的人,想来想去,只有住在虹口的一位黎惟忠黎观察,一位卢慕韩卢京卿,这二人均以商业起家,从前在香港贸易的时候,劳航芥做律师,很蒙他二位照顾。后来他二人都发了财,香港的本店自然有人经理,黎观察因本省绅商举他办理本省铁路,卢京卿想在上海替中国开创一片银行,因此他二位都有事来到上海。”^⑱这些形象都体现了广东商人特有的“勇于冒险,敢于开拓”的精神品格。

总的来说,晚清十里洋场素以“冒险家的乐园”而闻名于世,在上海向现代化文明大都市进军中,粤民的开拓者地位毋庸置疑。当晚清经济、文化中心逐渐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转移到开风气之盛的上海时,粤商紧随而至,他们中的成功者将领先一步的历史优势转化为较先进的贸易理念和较丰富的商业经验,成为上海滩最成功的商人群体之一,他们所表现的广东人特有的创新求变、开拓冒险意识,也得以广泛传播。

除了北上走沪,晚清粤民的行走历程,还体现在对海外世界的追求与开拓上。随着近代资

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完善,晚清国人逐渐被卷进世界市场的纽带之中,开始出现出洋务工、求学、游历等走向世界的诸多行动。特别是19世纪后期美国西部大开发,掘金风潮更是吸引大量华民趋之若鹜。此时的广东地区,粤民因生计而出洋务工的现象较内地更是频繁。因此,以海外现实生活为原型创作的“粤民出洋”题材作品开始在19世纪末的小说界大量涌现,主要有署名“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吴趼人《劫余灰》、黄小配《宦海潮》、许指严《猪仔还国记》、袁华《侨民泪》、《苦社会》(不题撰人)、署名“废物”的《凄风苦雨录》、题“古之伤心人著”的《致富术》、题“平陵浊物叙”的《新七侠五义》等。另外,还有一些作品涉及粤民出洋游历等情节,如黄小配《廿载繁华梦》等,这些晚清小说对于粤民出洋的生存状态都有典型反映。

晚清小说粤民出洋题材不仅指出粤民出国务工的悠久历史:“闽粤间细民,生计不足,即去之南洋各岛或新、旧金山,充当工役,往往有致富者,其来二百余年矣。”^②而且他们在全球的分布也十分广泛,“其时太平洋中的华人,美利坚全国约有十余万,檀香山约有二万余,古巴约有四万余”^③。这些出国华人当中又以粤民居多,如黄小配《宦海潮》写小说主人公张任磐至美国旧金山:“各华商邀请任磐先后到冈州会馆及宁阳会馆筵宴。因到金山大埠经商的,以广东新宁、新会、开平、恩平那四县人得多,那冈州会馆就是那四邑侨民的会馆。”^④

晚清粤民出洋务工无外乎两方面原因:一是利益的驱使,二是“猪仔”贩子连哄带骗手段的诱使:“不肖枭悍之徒,乃乘势趋利,为外人鹰犬,漂途人而货售之,外人便其生死听命,鞭策役使,有如牲畜,于是谋生之途,变为鬻奴之径矣。当其欺诱裹胁,捆载而去,不复以人道相待,名曰‘猪仔’。”^⑤《发财秘诀》中的高阿元,在香港一家“招工馆里做伙计”,历年来拐卖“猪仔”无数,连广东新安县县太爷的少爷也成了他的“囊中之物”^⑥。《劫余灰》描写的另一位拐卖猪仔者朱仲晦更是无赖,连还未完婚的亲侄女婿也成了他拐卖的对象。仗着洋人势力胡作非为的高阿元,瞒着家人拐亲卖友的朱仲晦,虽然都是晚清小说家深恶痛绝的鞭挞对象,但从侧面也说明这类时代特殊产物精明开放、胆大妄为的心理特征,表现出迥异于中国传统“商道”的海盗式劫掠的冒险行为与观念。

小说描述的“华民出洋”走的是一条悲惨至极的血泪之路。华民出洋以赴美为最早。据史载,早在1785年就有三位华裔海员抵达巴尔摩港,这是华人进入美国境内的首次记录。此后,华民赴美风潮时断时续,客观上为美国国内的经济建设提供极其优越的人力资源。19世纪是华民出洋的高峰期,据有关学者考察:“十九世纪有235万华工出洋到世界各地,其中东南亚地区占154.5万,美洲占58.6万,澳洲及新西兰7.8万,夏威夷3万。”^⑦美国为了本国经济建设的利益,曾于同治七年(1868)与中方签署《中美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第五条云:“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愿常住入籍,或愿随时来往,皆须听其自由,不得禁阻。”第六条云:“中国人至美国,或游历各处,或常行居住,美国必须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游历与常住之利益,俾中国人一体均沾。”^⑧但时值光绪三年(1877),美国国内经济发生波动,股票跌落,贸易不振,失业人数日增一日。因此,美国政府便开始了对华工的限制。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史无前例的《排华法案》,首次以法律形式禁止华工及华工子女入美,造成在美华工的强烈抗议。软弱无能的晚清政府迫于国内压力,与美政府进行多次交涉,于1894年在华盛顿签署限制华人旅美的《中美华工条约》。时至20世纪初期,美国虐待华工和限制华工入境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美国政府的粗暴行为终于激怒了在美华民和国内的爱国民众,国人于1905年掀起全面的抗美拒约运动,而国内的广州、上海等开埠口岸正是拒约运动的风潮中心。广东自古为著名的侨乡,因此,晚清书写侨民出国务工的很大一部分作品都以粤民在国外的生存状况为原型进行艺术加工。

晚清小说写出广东侨民在国外生活的种种苦状,可以用“惨无人道”一词加以形容:“况彼侨民者,岂尽适彼乐土,如入宝山,人人得为巴清、邓通耶?其流而踟蹰工场,手足胼胝,饱受奴隶牛马之鞭笞者,惨酷之状,殆非言语所能形容。”小说还具体写到美国檀香山发生疫情,美署责令在“唐衢”居住的所有中国侨民集体消毒清洗的可悲一幕,此间的中国侨民形象更是状如猪狗:

既而至一大场,三面筑铁杆短栏,一面驱众入,男妇老幼,来者不下数千人,纷纷扰扰,喧豕啼哭,如群豕之入茆。医官命以机器贮药水,放皮带管喷之,洒遍广场,势若骤雨,醍醐灌顶,衣履尽湿。余觉其水着肌,冰冷雪,时将深秋,早已不寒而栗,老稚不堪其虐者,号呼震天。有欲逃出者,则铁栏已周四面,且较前加高,众益惊异。^{②1}

晚清小说对于广东“猪仔”生活的真实描绘,形象地反映出在世界市场形成期中国民众因祖国积贫积弱而饱受欺凌的历史现实。

但从另一侧面,我们又不难看出海外“黄金世界”对于晚清粤民的诱惑之大,以至于成千上万的粤民依然前仆后继、如赴金山般纷纷出国:“时汽轮初通,华民皆炫于海外多宝窟,各具绝大希望以求偿,蚩蚩谈瀛,目眩口哆,如梦得黄金世界,俯拾即是者,意气自豪,抑何可笑。”^{②2}较之同时期中国内陆市民拥财自守的现实,以“机会主义”著称的粤民更愿意放眼世界,如拓荒者般寻找生机。如《侨民泪》中主人公麦君:“父设肆于星洲,家小康,年弱冠,既娶妇有子矣。顾性嗜拓张,工心计,守族世所囿,不足以厌野心。闻南洋爪哇岛多金属矿及金刚石,且饶棉花,以我国丝茶往,易彼土货来,获利倍蓰,乡里故旧有于其间致富者,不觉技痒,毅然挟货附舟行。”^{②3}最值得注意的是《黄金世界》对女子应友兰形象的描绘。应友兰乃广东新会人,她在小说中自述:“家世务农,我父我舅,会香港初开,以工致富,始弃农习商,又因合资营业,情意相投,一子一女,自小订婚。妹年十六,即赋于归……妹于此数年,始稍知生人之乐。不意金山分号的掌柜,忽传病信,亟须替人。夫婿欣然请之于舅,孑然独往。”而后,丈夫前往金山,一去不返,其子“坚欲赴金山省视”,转眼半年,也“鱼沉雁杳”,应友兰毅然子身“亲赴美洲探听父子两人的消息”^{②4}。这是中国小说史上首次塑造的毅然迈出国门、勇敢走向世界的中国妇女形象,深刻地反映出中国走向世界市场、开始主动拥抱世界文化的时代新征候。可以说,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应友兰形象出现于晚清小说的“粤民走海”叙述中,正透露出时人对晚清广东民众的时代前驱与先锋身份的一致体认。

小说中所书写的晚清粤民风潮般涌入世界市场,虽遭际苦难与不幸而百折不屈的状况,也预示着晚清广东开放、进取之文化精神的日趋成熟与完善。他们不再因“根”、“道”传统而“坐困经生”,不再因“涉洋遇险”而止步不前,他们在痛苦和血泪中努力摆脱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主动面向海洋寻找新的生机与出路。

三、清中晚期“粤民走海”叙述的叙事特征与启悟主题

清代中晚期以来逐渐出现的“新小说”写作,受到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它们借助舶来的翻译小说的各种叙事技巧,开始抛开以往的小说主题和旧有的叙事方式进行翻新改造,陈平原将这种改变归纳为“叙事模式的转变”。他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这一传统的

小说叙事模式,于20世纪初面临西方小说的严峻挑战,“在一系列‘对话’的过程中,外来小说形式的积极移植与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共同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这些转变表现在“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等方面^③。

叙事模式的转变在清中晚期广东题材的小说中初现端倪(最为典型的即是吴趼人《九命奇冤》采用倒叙手法,进行叙事时间上的创新),具体落在“粤民走海”叙述,这种转变则在表层上表现为面对社会变革,小说逐渐开始书写大量的西式景观,并对清代中晚期广东社会萌动的新生活形态与生存观念进行描述。而更深层的则是叙事结构与叙事主题的发展变化,这种发展根据前文所说的“出山入海”向“走沪出洋”的转变,也大体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家庭型叙事为主导,以传统人生如梦为主题;后一阶段以游历型叙事为主导,以社会批判与启悟为主题。

(一)以家庭型叙事为主导,以传统人生如梦为主题。从《岭南逸史》到《蜃楼志》,意味着清代广东叙述“出山入海”的转变,但在叙事特征上两书又有着较为明显的相似性,属于同一阶段的作品。它们走的大体与《金瓶梅》、《林兰香》、《红楼梦》等相似的情节套路,在叙事结构上往往从婚丧嫁娶的家庭型叙事出发,即以家庭兴衰为中心,进而延伸到官场、商场、青楼、战场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对主人公人生遭遇进行全景式的描绘,最后归为人生如梦、悟道出世的结局。《蜃楼志》作为“入海”之始的作品,相比而言,其家庭型叙事更具典型性。另外,文学表现总是有延后性,20世纪初问世的《廿载繁华梦》则是这一主题的余绪。

《蜃楼志》中的家庭型叙事占了重要的篇幅,小说的一个重头情节就是描绘“男女居室之私”,即男主人公苏吉士与妻妾的风流史。从文题来看《蜃楼志》,所谓“蜃”,原意指“大蛤蜊”,《周礼·天官·鳖人》载:“春献蟹蜃,秋献龟鱼。”^④后演为一种能吐气成海市蜃楼的蛟龙。可见,关于《蜃楼志》小说的得名,很容易就能看出小说的创作意图在于“虚以应实”。虽然署名罗浮居士所题的《〈蜃楼志〉小说序》强调“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所撰《蜃楼志》一书,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也”。风光是粤东真实风光的描绘,但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一开头就将小说定位在看破红尘的基调之上:“捉襟露肘兴阑珊,百折江湖一野鹑。傲骨尚能强健在,弱翎应是倦飞还。春事暮,夕阳残,云心漠漠水心闲。凭将落魄生花笔,触破人间名利关。”^⑤从文题出发,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是:“蜃楼”图景无论怎样绚丽多姿,最终总是有谢幕的那一刻,“春事暮,夕阳残”,等待人们的结局就是与“人间名利”的最终告别。

《蜃楼志》的总体结构就是一个幻梦的构建。全书以广东洋行商总苏万魁被粤海关监督赫广大拿住短处敲诈起篇,重点书写苏万魁之子苏吉士的成长过程。苏家是当时广州城中“绝顶的富翁”,“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但是,苏万魁以敛财最终遭人劫盗而心惊致死,苏吉士以散财放浪最终名利双收。小说通过苏家父子的财富观念与人生收场的对比描写,无疑是向读者揭示“世途多幻境,钱财扰人忧”的人生哲理。

黄小配的《廿载繁华梦》问世与《蜃楼志》虽然相隔百年之久,但在创作主旨、题材内容、叙事结构等方面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廿载繁华梦》取材于晚清广东南海周氏作为海关库书的真实事迹,全景展示了周氏的一生浮沉,其间穿插着对周庸祐家庭生活的描写。

《廿载繁华梦》的梦幻特点也从文题中不言而喻。署名“华亭过客学吕谨”所作《序》中这样介绍小说的创作缘起:“沧桑大陆,依稀留劫外之棋;混沌众生,仿佛入邯郸之道。香迷蝴蝶,痴梦难醒;悟到木犀,灵魂已散。看几许英雄儿女,滚滚风尘,都付与衰草夕阳,茫茫今古……虽水莲泡影,达观久付虚空;然飞絮沾濡,识者能无感喟?此《廿载繁华梦》之所由作也。”^⑥可见,“梦”的构建与破灭也是《廿载繁华梦》所要表现的主题。但与《蜃楼志》稍有不同的是,《廿载繁

《华梦》中的“梦”在叙述上贯穿小说始终。

小说中充满了对“梦”的象征性诠释。小说开篇就将故事的发生背景设定在“不知何时何代”的子虚乌有的广东海关里：“而今单说一位姓周的，唤做庸祐，别号栋臣。这个人说来倒是广东一段佳话。若问这个人生在何时何代，说书的人倒忘却了。”^⑤接着通篇书写广东海关库书周庸祐于宦海、商海、情海中浮沉的一生。而作者在最后也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个迷雾般的结局：“周庸祐……只自想从前富贵，未尝作些公益事，使有益同胞，只养成一家的骄奢淫佚。转眼成空，此后即四海为家，亦复谁人怜我？但事到如此，不得不去，便向马氏及儿子嘱咐些家事。此时离别之苦，更不必说。即如存的各房姨妾，纵散的散，走的走，此后亦不必计，且眼前逃走要紧，也不暇相顾。想到儿子长大，更不知何时方回来婚娶，真是半世繁华，抵如春梦。那日大哭一场，竟附法国邮船，由星加坡复往暹罗而去，不知所终。”^⑥作品通过对周庸祐一生经历的描写，起于荒无，迄于荒无，传达人生如同一场幻梦的题旨。

从题材内容上说，《蜃楼志》与《廿载繁华梦》成为自《金瓶梅》开其端，《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歧路灯》接踵其后的中国古代小说家庭型叙事的终结性作品，尤其是《蜃楼志》被认为是家庭小说最后的重要作品，《廿载繁华梦》则只是式微后的余绪而已。如果结合《蜃楼志》作为“粤民走海”叙事起点的观点来看，《蜃楼志》集终结与开启于一身，其小说史上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蜃楼志》与《廿载繁华梦》虽然路径手法不同，但殊途同归，终于对人生的大彻大悟。这种以梦幻主题构建故事情节的笔法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不在少数。但与此前作品相比，《蜃楼志》与《廿载繁华梦》的“近代化”特色十分明显，即将梦幻的“虚”与特殊时代内容的“实”有机结合在一起，一个关于传统梦幻的虚拟故事构架却与资本主义风潮汹涌东进后“洋行”林立、“洋货”流行的近代社会图景交织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建立在现实平台上的蜃楼图景，传统观念之虚与异质文化之实，虚实相映，怪诞而奇异。

时至晚清，以梦幻主题构建故事情节的广东题材小说作品还有张春帆的《七载繁华梦》、黄小配的《宦海潮》等。晚清小说家在书写人生幻梦的同时，似乎也预告了中国古典小说作品在梦幻叙述传统上的阶段性终结。究其原因，“写梦”无出两点：一是对神秘世界的迷惑，二是对现实世界的失落。无论是“蜃楼”也好，“幻梦”也罢，我们不难看出即使前后相隔百年之久，中国旧知识分子企图通过小说探寻老大中国的出路时，借助西方文化的简单嫁接并不能找到解救的药方。时代与自身视野的局限使他们几乎看不到出路，心中回旋的只能是行将破灭的“海市蜃楼”、“繁华美梦”。但是无论怎样，《蜃楼志》与《廿载繁华梦》既是一种旧题材类型的终结，也是新类型的开启。晚清小说家通过手中之笔在宣告着古老梦境的破碎时，还是依稀让人看见时代新境界重建的希望。

（二）以游历型叙事为主导，以社会批判与启悟为主题。时代新境界的重建在梦幻破碎之时已然开始。在《廿载繁华梦》中，周庸祐与妻子马氏已经飘洋出海，乘船前往南洋一带“逛逛”，“旷些眼界”^⑦。小说最后，周庸祐干脆搭乘法国邮船，由星加坡复往暹罗而去。在20世纪初，随着粤民走沪与出洋人数的增多，晚清“粤民走海”叙述中的游历型叙事成为潮流。

这类小说在题材内容上大体相似，多是反映华民（以粤民为代表）走沪与出洋的奋斗史，尤其关注粤民在国外艰苦谋生的曲折遭遇。就叙事而言，它超越家庭型叙事的特点正在于其开放性的叙事结构，正如陈平原所指出，它体现了“新小说家某种特殊的小说结构意识”：“找到了‘旅行者’这么一个特殊的角色，只要把一切作者所要表现的生活现象与生活感受都和主人公的‘游历’挂上钩，小说自然就获得一种表面的整体感。倘若主人公的游历不仅仅是一根

穿起一串散珠的丝线,而是跟其心灵的成长和思想的变迁紧紧纠合在一起,那长篇小说就真正称得上‘遂成一团结之局’了。”^③换言之,通过游历者的视野不仅可以展示家庭之外的广泛社会生活面,紧密关合小说的叙事结构,还可以超越传统游历述异的取向,自然地导出关于人生与社会“启悟”的思想主题。

晚清“粤民走海”叙述与此前的出洋题材不同的是:同为出洋,但已从玄怪想象转变为现实的亲身体验,同样写海外遇险,已由神秘力量拯救遇险的粤民,转变为粤民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记录所见所闻,并寻求方法使自己脱离困境,同样写海外图景,与以往神秘美好的幻想相比,此时的海外却变成出洋淘金的炼狱,再也没有前代小说中“得利而归”的美好结局,这些故事情节大都有现实事件的支撑,不少内容“作于旅美华工,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固宜情真语切,纸上跃然,非凭空结撰者比”^④。正因为有所经历,所以小说中的种种描述更有呼吁民众为保国保种而觉醒的现实说服力。晚清小说家将出洋华工在国外遭遇的种种诉诸笔端,书写中国人在国外的情与事,客观上也促使他们以时代的眼光关注现实世界,从而跳出了传统小说创作内容与书写风格的桎梏,其时代意义十分突出。

与传统游历型叙事更有所不同的是,由游历叙事体现出较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既有人生的启悟,又有对社会现实的针砭,更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晚清小说家往往通过小说人物在游历过程中的闻见,抒发旅途的感想,表达作者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思想倾向。这与古代传统游历型作品简单地表达旅途感受或对神秘世界的困惑迥然有别。以《黄金世界》为例,小说借人物何去非之口鞭挞中国民众尤其是上层阶级团结合作精神的严重匮乏,借张氏之口倡导中国女权精神的张扬,借夏建威之口陈述“开农牧、兴制造、辟路矿”的举措对国家命脉的重要性;借朱怀祖之建设螺岛大同世界的实际行动描画作者本人对建设未来新世界的理想和政治主张。这些都是作者内在心声的真实传达。

而黄小配发表于1908年的《宦海潮》,是晚清以抗美拒约运动为题材的小说作品中较为特殊的一部。它不是以出洋华工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叙事线索,而是描绘在抗美拒约运动的背景下,清政府以保护海外华民为由,派驻使臣、广东南海人张任磐前往美国等国进行高层交涉的作品,小说以张氏在游历海外各国时的亲历亲见为线索。该书的政治隐喻在小说《凡例》中陈述得十分明白:“是书有国家种族之感情。如观虐禁华工,而保种之情可以出;观割利权、赔重款,而保国之念可以生;观专制淫威,忽然假命杀人,忽然推翻政局,而政治之思想,可以悠然发现。”^⑤

上述小说中所叙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受到西方“民主”、“平等”、“博爱”、“权利”等思想观念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深层意义上而言,时值晚清大厦将倾之际,晚清小说家力图聚焦于现实题材,在痛楚与血泪中寻找中国的出路。正如小说家吴趼人所言:“以仆之眼,观于今日之社会,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意见所及,因以小说体,一畅言之。虽然,此特仆一人之见解耳。一人之见,比不能免于偏,海内小说家,亦有关心社会,而所见与仆不同者乎?盖亦各出其见解,演为稗官,而相与讨论社会之状况欤?”^⑥可见,晚清小说家已开始摆脱小说作为“小道”的传统标识,争取与政治家、革命家同等地位的身份,作为社会舆论的代言者,为中国寻找新的生途。

总言之,清代中晚期“粤民走海”叙述在文学方面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两方面的转化:一是以家庭型叙事为主导向以游历型叙事为主导的跨越;二是传统人生如梦主题向社会批判与启悟主题的转换。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叙事方面都实现从古老的幻想虚境向具有现代意义新世界的过渡,就题材内容而言,清代中晚期“粤民走海”叙述在家庭生活之外,探求更为广阔

的社会空间,超越了传统游历型叙事的固有模式,摆脱了幻仙、幻奇的精神内核,开始走上社会写实的道路,并真诚地提出自己的思考,这多少象征着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家庭叙事的终结,从而成为中国小说史从古典形式走向现代形式的重要衔接。尽管民国以降,现代小说史上已较少出现以边走边看的游历主题来构建小说故事情节的作品,但是这部分作品作为时代真实记录,“始睁眼看世界”,其意义不可磨灭。从演进的角度来说,它们为开创中国现代小说主题叙述的新境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清中晚期“粤民走海”叙述的先锋意义

清代中晚期小说中粤民“出山入海”和“走沪出洋”的文学叙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可谓别开生面,其文化价值极具先锋色彩。

首先,清中晚期的广东题材小说第一次全面而真实地书写了得天下风气之先的广东人,如何走向大海,谋求生存、发展的历史征程。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海洋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42]当西方早已进入到海洋争霸时代时,而中国依然主要活动在陆地,“只以大海为界”。近代世界市场开发以前的中国表现出传统内敛、自给自足的文化特征。即使是唐时的丝绸之路已将当时的中西世界联系得十分紧密,但很少有中国人关注陆地以外的海洋世界。大多数中国民众习惯于背对着海洋重复着千百年的传统内陆型社会生活。清中期以前小说对于广东社会生活的描述,深受传统小说创作题材与思路的禁锢,具有传统的内陆特色——平稳、封闭、单调。虽然间或也有部分作品抒发对海洋的向往,但数量极少,在明清以前的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所占比重极轻。明清以降,随着近代世界市场的形成,与西洋文化联系日益深入的粤民开始将目光转向海洋,面朝大海开始了不同于传统生存之道的海外拓展实践,这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举。

其次是在书写的广度和深度上。清中晚期小说对“粤民走海”历史进程的书写,概括而言,大致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即内圈扩张型“出山入海”的成功跨越与外圈辐射型“一点三线”的延展拓进。

第一阶段是“出山入海”,前文已经从小说文本的角度对此做了分析,即从《岭南逸史》到《蜃楼志》的转换意味着广东文化“出山入海”的初步跨越。这无疑是广东文化实现自我超越的重要阶段。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现象,笔者从另一个角度,即区域文化发展差异的角度来加以进一步印证和阐释。前面提到,广东在传统上有三大民系:广府、潮汕和客家,广府人占住珠三角最富庶发达的区域,潮汕人则占住粤东沿海一线,客家人则多在广东最贫困的北部山区。一般认为,广府人灵活,潮汕人勇敢,客家人刻苦;广府人、潮汕人愿意出外闯荡,客家人则带有较浓重的中原情结。这三大民系族群,各具特色,在人文方面具有丰富的差异性。依此观照清代中晚期,面对西方外来文化的侵袭,广东社会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这一进程促使了广东民系的分化。从结果可以看出,当社会转型的最终选择使处于广府、潮汕地带的区域文化成为广东社会的主导文化时,北部的客家民系显然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它的落伍不可避免。与此相对应,代表北部客家文化的《岭南逸史》注定被描写广府的《蜃楼志》所取代,这种由内而外的“出山入海”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在完成“出山入海”的跨越之后,粤民开始了海上拓展。正如研究者在分析海洋的辐射功能时指出,四通八达的海洋具有明显的对外辐射性与交流性,在无线通讯等现代设备发明之前:“人类文化的对外辐射和交流,尤其是异域异质文化之间跨海的亦即跨国、跨民族、跨地区的文化辐射与交流,都是依傍于海洋才发生的。”^③时至19世纪后期,一股以广东为起点,北走上海、南下南洋、东达美洲三条线路的“淘金热”开始在广东社会蓬勃生发,这是“粤民走海”的第二阶段,最终结果是实现了从走出本乡到走出本土,由内而外融入世界的大跨越。此时出现的粤民出洋题材小说不仅是时代热潮的真实反映,更是对广东文化中日趋成熟的海洋特征的最佳诠释。

更重要的是,清代中晚期的小说家通过文学叙述,见证了一种海洋文化观念的逐渐成型,通过描述粤民北上、南下、东进的传奇故事,来表达小说家们对于粤民探索新世界的不懈思考。“粤民走海”叙述所透露出来的关于粤民开眼看世界、游世界,以及率先吸收与引进世界先进文化,表达自由、民主、平等的近代思想等信息,印证和提示了晚清广东海洋文化观的渐趋成熟。当笔下主人公的纷纷脱离内陆,奔向海洋,向海外去寻求机遇与财富时,作家内心的冲动可想而知,它不正反映了转型时代的中国小说家为实践广东文化由内而外的近代突破与转型而付出的努力吗?小说家对于粤民“走沪”、“出洋”的文学书写,表征了晚清中国尤其在东南沿海城市,一种新型的、以开放外拓为特点的、具有显著近代色彩的海洋文化,开始冲破传统文化机制一统天下的牢笼,已经破茧而出,始作彩蝶振翅之声。

当然,小说中也充满了作家们的犹疑与困惑,一方面以直面人生的写作态度控诉社会的黑暗与不公,表达进步的社会理想,如碧荷馆主人《黄金世界》、黄小配《宦海潮》等都注重从西方思想文化中汲取营养,试图提出疗救社会、拯救国家于危亡的进步方案。另一方面在反映时代主题的同时,又夹杂着诸多陈旧的思想因素,如落后的家庭伦理思想、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如果说向海洋寻求出路是广东文化发展路途中迈出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只能说是对外方文化的外部学习与模仿,要将其转化为本身的文化肌体,并从根本上改造传统观念,显然,这要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才得以实现。从清代中晚期到“五四”,还有不短的一段路要走,就此而言,清代中晚期的“粤民走海”叙述还仅仅是个开始。

① 林语堂在《中国人》中这样论述广东人:“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性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② 凌濛初《拍案惊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③ 冯梦龙《喻世明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④ 佚名:《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226、236—248、321—329页。

⑤ 张应俞《江湖奇闻杜骗新书》,江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7—99、192—193页。

⑥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14页。

⑦ 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一卷第271页。

⑧ 嘉庆《龙江县志》卷四,转引自谭元亨《岭南文化艺术》,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⑨ 古吴娥川主人《世无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

⑩ 翻检明清作品,笔者只发现清拟话本小说集《珍珠舶》卷六写一位“自家生在广东,长游江北”的穿堂入巷的花和尚证空,在松江府娄县古柏庵任住持(参见徐震《珍珠舶》,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⑪⑫ 吴趼人《恨海》,《吴趼人全集》,北京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五卷第4页,第4页。

⑬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⑭ 许瑶光《谈浙》,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5页。

- ⑭ 叶春生《岭南民间文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 ⑮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064页。
- ⑰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全集》,第一卷第132页。
- ⑱ 黄小配《廿载繁华梦》,《晚清小说大系》,台湾广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01页。
- ⑲ 李伯元《文明小史》,《李伯元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329页。
- ⑳㉓ 许指严《猪仔还国记》,《晚清小说大系》,第1页,第1页。
- ㉑ 碧荷馆主人《黄金世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
- ㉔㉕ 黄小配《宦海潮》,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第2页。
- ㉔ 吴趼人《发财秘诀》,《吴趼人全集》,第三卷第38页。
- ㉕ 管林、陈永标、汪松涛《岭南晚清文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 ㉖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页。
- ㉗㉘㉙ 袁华《侨民泪》,《晚清小说大系》,第9页,第2页,第1页。
- ㉙ 碧荷馆主人《黄金世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230页。
- ㉚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 ㉛ 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 ㉜ 庾岭芳人《蜃楼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 ㉜㉝㉞㉟ 黄小配《廿载繁华梦》,《晚清小说大系》,第1页,第285页,第149页,150页。
- ㉟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241页。
- ㊱ 佚名《苦社会(叙)》,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 ㊲ 吴趼人《上海游踪录·自跋》,《晚清小说大系》,第61页。
- ㊳ 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历史的地理基础”,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92—93页。
- ㊴ 曲金良《海洋文化与社会》,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山木

·书 讯·

《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

岑献青 主编

新华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出版

《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收录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七七级 48 位同学以及部分老师的回忆文章,深情记录了同学之间的真挚友情和师生之间亦师亦友的珍贵情谊,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北大学子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情趣追求。

本书分为三部分:“我们同学”收录了全班同学的学籍资料和他们为本书所作的文章;“我们老师”收录了 16 位北大知名教授的题字、寄语及文章;“我们记录”收录了四年学习、活动的文字和图片,包括当年的班级刊物《早晨》。全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格调高雅、真实感人。

七七级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批圆了大学梦的人,北大文学七七级是中国七七级大学生的一个缩影。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是一代人的标志,也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亲历者、见证人,从他们的经历和成长中,可以印证时代和民族的发展变化历程,有助于人们正确回顾历史,积极面向未来。